

对于符号间性分类的初步准备¹²

约伦·索内松/文

杨蓝/译 彭佳/校

用一种符号学方法进行翻译的特殊性通常通过两句名言体现出来，这两句名言分别独立，但通常可以整合在一起，其中一句出自罗曼·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另一句则出自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第一句在雅柯布森（Jakobson's 1959: 233）对术语“翻译”的扩展性补充中表现出来，超越了他一直称道的“严格定义的翻译（translation proper）”，即“用另一种语言来解释一种语言符号”。除此之外，雅柯布森还提出了其他两种翻译类型：“重写”，即“用同一种语言的其他符号来解释该语言”；“变换，即“用非语言符号来解释语言符号”。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第二句用语。

该模式也可称为隐喻，毋庸置疑，它取得了具有创造性的成就。就其意义而言，在亚里士多德之后，麦克斯·布莱克（Max Black 1962）发现了以下两种观点：发现新事物的过程及其方法和创造新事物的过程及其方法。在此之前，一直没有人发现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see also Ricœur; Sonesson 2015a）。隐喻很有可能是一个研究领域的起源。然而，如果该研究领域将取得丰硕的成果，那不可能仅遵循于这一个发现。这就是我在近期发表的论文（Sonesson 2014a,b）中提出以下建议的原因：我们是时候进一步使用隐喻了，也是时候讲清楚这三种符号体系间行为的差异了。丁达·戈尔莱（Dinda Gorlée 2015）在近期出版的一本书中清楚地表达了与我完全对立的观点。她试图把她所称的“引号中的‘翻译’”（2015: 9）与雅柯布森的“严格定义的翻译”（即不用引号的翻译）区分开来。此外，戈尔莱还提出了“转导”，似乎与雅各布森所提出的“变换”相对应（在索内松[Sonesson 2014b: 268]发表的论文中又称其为‘移位’）。³

这与戈尔莱（Gorlée 1994）、苏珊·佩特里利（Susan Petrilli 2003）及彼得·特洛普（Peeter Torop 2003）一样引人注目。在众多学者中，他们是我批评的，批评他们忽略了超越这些符号体系间行为的相似之处，忽略了去探究它们是如何不同的。在向这一成就致敬之后，我也想借此机会详述我认为在戈尔莱著作中原隐喻所留下的残余

¹ 丁达·戈尔莱（2015）的评论。《从翻译到转导：符号间性的本质》。塔尔图。塔尔图大学出版社。

² 原文：Sonesson, G. (2017). Preliminaries to a Taxonomy of Intersemiosis. *Punctum*, 3(1), 119-131.

³ 对于相似并互补的观点，请参阅贾（2017），但这并未考虑到戈尔莱最近出版的书籍，也未考虑我的论文。

物，同时也想从戈尔莱所提出的观点中得到一些启发，这些观点可能有助于推动基于“引号中的‘翻译’”翻译符号学的研究。

1. 基本符号过程内部的“翻译”

人们可以依靠戈尔莱（Gorlée 1994；2015）的文章去深入钻研各种各样的皮尔斯语录。在文章中，戈尔莱非常擅长引用皮尔斯语录，包括那些来自只能在布卢明顿为了获得稿源而饮酒的少数人中才能获得的引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戈尔莱的新书，就像她早期发表的那本书一样，是那些想要尽可能找出皮尔斯真正想要表达什么的研究者的源泉。换句话说，戈尔莱的新书早已具有价值，它可以说是解释皮尔斯语录的随身手册。然而，在这篇评论文章中，我只会采用“引号中的‘翻译’”研究所做的贡献，即广为人知的符号间性研究。

当然，戈尔莱把翻译研究与对皮尔斯哲学的解释结合在一起是有理可循的。确实，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in Sonesson 2014a,b），在雅柯布森所提出的隐喻允许通过目前的符号学方法去认识符号间性之后，第二句用语源于皮尔斯的论点，即一个符号的意思是把对该符号某部分（包括代表、对象、解释项）的“翻译”（此处有引号）与其他符号相结合的过程。

在戈尔莱的书中，通常情况下，这个想法从根本上被限制为将解释项的“翻译”成其他解释项，等等。不论皮尔斯描述的现象是什么，它在雅柯布森提出的任何一个广泛含义中都不能用翻译来识别。在到如今也堪称经典的一篇文章中，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67）用皮尔斯一系列的解釋項對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進行解釋，接着德里達選擇將其推廣至全世界（儘管其目的不只這一點：見索內松[see Sonesson 2015b]）。泰倫斯·迪肯（Terrence Deacon 1997），同樣從皮爾斯一系列的解釋項出發，沒有了解它就得出結論，提出了與索緒爾語言學（See Sonesson 2006）無法區分的語言觀。他們可能並沒有完全錯。

事實上，皮爾斯所指的翻譯可能就是這個意思，也可能有很多其他的含義。翻譯項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含義，其中有的是基於語言系統層面的含義，也有的是基於某種特定的言語情境而產生的含義。首先，翻譯的含義可以根據索緒爾提出的理論-橫聚合段和縱聚合段的二元性來區分，要更具體的則可參照葉爾姆斯列夫的具有明確語法意義的理論；廣義上的“語義場”在德國古典語言學中更多的是指一種語義概念；總的來說，語言結構由關係網絡組成，就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而言，語言結構是所指和能指修辭格的真實性。上世紀六十或七十年代誕生了喬姆斯基的形而上學論，如果你是該理論的信仰者，你甚至可能在此基礎上加入所有相關的理論，包括表層結構、深層結構、轉換、過濾、制約條件及你自己的理論，但在近期針對形而上學論的實例中所涉及的相关理論少之又少。當然，所有的含義可能都來自一個具體情境和/或上下文中的一个特定語篇，該語篇可能以簡單的關聯性實例展開，這些例子可通過邏輯推理法得到，也可從社會共享或或多或少的人際交往中得到。也許皮爾斯的翻譯理論符

合以上提到的所有案例，但随后需要对其进行区分。据我所知，普通语言学在研究语言意识内部的这些不同“翻译”方法之间的差异方面还没有取得很大进展（在其他符号资源中应该能找到相似的案例），但即使是基于相当经典见解的以上描述也比皮尔斯的“翻译”概念更进一步。

显而易见，皮尔斯的翻译概念要比我们通常所说的翻译更基础。当然，皮尔斯的翻译概念可以通过改进使“翻译”这一术语在一般的语言意义上获得一个更为精确的概念，这是可想而知的，但在我看来，戈尔莱在她的书中并没有设法这样做。用皮尔斯的话来说，不要停止探究，我们需要寻找出皮尔斯的作品集之外的一个更大的研究领域，探究我们是否只是为了理解皮尔斯所设想的“引号中的‘翻译’”，或者探究我们是否想要掌握雅柯布森提出的“严格定义的翻译”、“重写”及“变换”彼此之间的差异。

2. 语言之间：翻译与符号翻译

人们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戈尔莱引号之外的翻译与雅柯布森的“严格定义的翻译”是一回事。然而，该书的第二章节（p.20ff）中提到翻译已有定义，只有被取代（p.25f,28ff）才是“符号翻译”的概念。戈尔莱（Gorlée 2015: 20）称：“翻译是理想的目标，它可以用另一种语言对等的文本材料来完整并单向地再现一种语言的源文本材料。”显而易见，这样的目标永远无法实现，因此必须转导为“符号翻译”。戈尔莱以多种方式试图限制‘符号翻译’的本质，值得注意的是，在皮尔斯的“准心灵”中的“不完美”拟符号过程中，皮尔斯不是追求逻辑第三性的“完美”符号/.../，而是将其变得柔和（或弱化）。然而，它只有在文本中才取得进展，戈尔莱谈到翻译是一种试推法，她根据皮尔斯的情感解释、能量解释及逻辑解释把符号翻译与转导结合起来，如此一来，这种区别开始变得有意义。

然而，问题依然存在，即考虑到现实世界的严酷，或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符号学本身，如何将符号行为的“理想目标”与其已实现的实际可能性分开。当然，这里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也正如我提到的那样（in Sonesson 2014a,b），当不同的符号资源都聚在一起时，这些困难会变得更大。但是任何一个翻译（严格定义的翻译）的目标持续在两种尽可能地采用不同符号资源的文本之间建立一种特别紧密的对等关系，那么符号翻译就与翻译是一回事；或者符号翻译是另一种有不同目标的符号行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有理由认为或许戈尔莱至少有时会打算采用后者的解释（但正如后面的章节提到的那样，符号翻译可能会逐渐变为转导）。确实，这可能是真的，正如托马斯·蒙克（Thomas Munck 2000:4）所提到的那样，十八世纪的翻译人员总是不去追求“准确”，他们可能更多地作为调解者去让一本原著适应某些特定读者的心态。在中世纪，即使抄袭一篇手稿也无法通过其评论与原稿明显区分开来，这一点不足为奇。中世纪著作《曼德维尔游记》一发表就被迅速翻译成至少十种语言，伊恩·麦克莱德·希金（Ian Macleod Higgins 1997）对其不同的

翻译版本进行了详细研究，正如研究中所显示的那样，的确，译者（人数甚至比使用同种语言的抄袭者还多）在文本中添加整个故事也没有问题，他们压制文本中的其他内容，甚至改变文本中观看事件的意识形态（比如当时的宗教立场）。据我所知，对于当时伊恩·麦克莱德·希金认为“翻译”意味着什么，及上述译者的译法是否适用于这种文本，甚至在文本中经常不出现人物名，这些都没有记载。不论使用什么术语，那时的翻译理念明显不同于当代翻译。并且，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目前的关键任务应该是通过翻译重建我们现在的意思。

在其他文章中，我也提到过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双重的语言传播行为。为了掌握翻译的本质，我们必须从这种语言传播行为的某种特定思想入手，这一点我在其他文章中提到过（see Sonesson 1999; 2014a,b）：根据这种双重的语言传播行为，接收者（读者）也是能动的主体，他们必须把来自发送者（译者）生产（翻译）的人工制品（译文）具体化为一种感知；在一种言语传播行为中，接收者通过处理获得的解释中任意两部分的资源将其部分重复，因此，为了让这种言语传播行为获得成功，接收者将必须找回其他所有剩余的资源，或者找回其中的一部分；然而，如果发送者与接收者处于不同的文化中和/或使用不同的语言，这种言语交际、传播会变得更加困难，更不用说两者用不同的符号资源了；对于双重言语传播的三个参与者来说，这一点毋庸置疑。

显而易见，鉴于这种传播模式，译者必须成为双重的能动主体，既要充当解释者，又要成为一个新文本的创造者。他或她在其中一种言语传播行为中是接受者，那在另一种言语传播中就是发送者。因此，尽管可能程度不同，但任何适当的翻译都需要考虑两种发送的语境和两种接收的语境。第一个发送者的语境来自原语言者/原作者，第二个发送者则来自译者本身。同样地，第一个接收者的语境来自翻译文本，第二个接收者的语境则来自译者本身。

对于存在双重言语传播行为的情形，在适当的情况下，两种言语传播的内容应该通过这两种行为能完全相同，雅柯布森称此为“语内翻译”和“符际翻译”，但基于不同的原因，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整个过程中，译者尽可能地把相同的含义传递给读者，读者再处理这些不同和/或有限的知识。翻译本身由尽可能地传递相同思想这个目标所引导。其他符号学行为也是存在可能性的，但如果这些符号学行为不遵循这一规则，它们则不会构成不合格翻译的例子。

虽然戈尔莱从没有特别清楚地提到过，但她（Gorlée 2015, 23, 59, 101ff.等）似乎反复暗示，索绪尔由所指和能指所组成的语言概念应该会使翻译变得很简单，但这完全是误解。教授我普通语言学的老教授贝蒂尔·马尔姆贝里（Bertil Malmberg 1971; 1974）从不厌倦观察，他提到：鉴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概念，翻译应该是不可能的；然而，翻译又是必需的⁴。戈尔莱（Gorlée 2015: 69ff）明显也有相同的观点，她在引用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后，还是低估了其重要性。然而，她可能会过度使用

4 西尔弗斯坦也提出了一个观点（2003: 76ff）。

后者，当她引用叶尔姆斯列夫的经典例子时，即“我不知道”在不同的语言中形成不同，甚至在词语和词类的层面上也会不同，她（p.70ff）仅使用和延伸他的来自印欧语系的例子。然而，根本的一点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跟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似乎一样会导致一个难题，而当面对翻译任务时，为了显示除皮尔斯对此难题有解决方案，最好建议戈尔莱从这个难题入手。然而，即使在这个案例中，她也不会完成任务，因为正如我们之前所见，皮尔斯的概念太过笼统而不能解释翻译本身的特殊性，更无法解释“引号中的‘翻译’”。

3. 语言之间不同的符号资源

从表面上看，戈尔莱（Gorlée 2015: 9）通过转导很清楚的表达了其含义：“它涉及的‘翻译’的平行并不适用于语言，而适用于涉及不同学科的教义、教育和情感方面的非语言结构的媒介间性。”如果这个定义的后半部分相当复杂，那么在专门用于转导的部分（Gorlée 2015: 91ff）以及关于该术语的最终说明（Gorlée 2015: 231ff）中，情节变得更加浓厚。转导似乎可以通过翻译“从英文到中文的情书，从阿拉伯语到荷兰语的合法婚姻合同，从古意大利语到现代英语的歌剧剧本”等内容（Gorlée 2015: 20, 91）得以体现。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例子，之后我将提到：以上引入的这些案例都是戈尔莱对讨论符际行为做出的重要贡献。但很明显，这些不是将一种符号资源转导为另一种符号资源的情况；相反，它们使翻译变得更加复杂，这是由于对某种特定的社会实践进行规划而产生的跨文化差异引起的。针对此情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混淆语言与文化，这一点很重要：虽然墨西哥西班牙语与西班牙的西班牙语没有太大差别，但文化习俗却大不相同，尤其是两者对于礼貌行为的不同理解（see Dunér & Sonesson 2016）。但就目前而言，我们的基本任务是找出区别翻译本身与雅柯布森所称的变换间的方法。

戈尔莱（Gorlée 2015: 17, 101, 109, etc.）在书中几处都提到一篇由迈克尔·西尔弗斯坦（Michael Silverstein 2003）撰写的文章，其标题为“翻译、转导、与转换”。⁵在这篇文章中，西尔弗斯坦对转导的定义（戈尔莱没有引用该定义）比起戈尔莱对转导各种各样的解释似乎更加复杂，但它仍然可能让我们了解这个利害攸关的问题：

重构源符号组织的过程（此处指的是在原始问题中，出现在源语言语境中有指称意义的词语和表达）通过另一种语言在目标语境中的表达及可能通过有不同组织形式且多种多样的符号形态得以呈现。（让我们暂时规定，一般情况下，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在多维度层面上是“相似”的。）（西尔弗斯坦 2003: 83）

5 戈尔莱还在书中参考了基恩的文章（2013.10）。基恩应用了西尔弗斯坦提出的术语，但他把该术语应用到了更深奥的意义上：“从无形到可见，从非物质到物质，从明白易懂到明智。”

从这个意义上讲，“转导”显然不一定是雅柯布森提出的“转换”。相反，就像戈尔莱提出的术语“符际翻译”一样，西尔弗斯坦（和戈尔莱）定义的转导似乎被要求去表明以下观点：正如马尔姆贝里所说，翻译，虽然原则上是不可能的，但仍然是必须的。或者，换句话说，虽然雅柯布森与埃科将香农—韦弗模式强加给了我们，但翻译不像编码和解码，这些术语指的是用摩尔斯电码来代替我们平常所用的字母表，还是用零和一来代替在电脑显示器上出现的任何事物（see Sonesson 1999）。这可以通过希尔勒设计的“中国房间”思维试验的深层理念来完成，原因仅仅是因为有人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即制作一本房内文盲可以参考的书。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根据西尔弗斯坦（Silverstein 2003: 91）和戈尔莱（Gorlée 2015: 117ff）的说法，转导和转换只是进一步远离作为转录且不可能实现的翻译理想目标，但这正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翻译（翻译本身）。

在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详细说明“严格定义的翻译”（翻译本身）与雅柯布森提出的“变换”之间的不同，这非常有用（根据西尔弗斯坦，我认为这是基于‘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在多维度层面上并不“相似”’理念的转导）。正如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 2004）所评论的那样，从语言到电影再到静态图片的“翻译”必须在原基础上添加许多新的事实（人物的具体外观等）。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观察到的那样（Sonesson 2014a,b），这句评语可以通过指出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同样适用的方面来反驳，这一事实无疑激发了西尔弗斯坦和戈尔莱也使用了对于该事物的新术语。然而，显而易见，这种信息差异（比如一张图片和一段语言之间）必然会更大。毕竟，从丰富的现实经验中选择相关的语言可能差异很大，但它总是在一个维度上变化，而其他一些符号资源则是多维的。

莎士比亚的戏剧《麦克白》，我们只知道它是一种语言文本，引起了很多包括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黑泽明（Akira Kurosawa）和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在内做出的电影解读；当然，它也是许多戏剧表现形式的起源，其中大部分都没有保存到现在，包括那些莎士比亚自己的公司所出的戏剧。那我们只需考虑标题人物“麦克白”即可。将这个单一的人物“翻译”并展现出视觉形式，取决于许多不同方面的各种选择：皇冠的种类，头部的形状，鼻子的形状，脸颊轮廓，眼睛的颜色，胡须的种类等。当然，在电影院或图像中，你通常不会选择其中的许多参数（在某种程度上，除了以上列项中的皇冠和胡须）：你必须根据剧中特定演员的名字来做一个扩展的演员特征表。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你对演员每个特征的个人选择是虚构的，但某些选择可能比其他选择更重要，并决定了要选择怎样的演员。另一方面，在绘画中，在动画电影中，或在看起来或多或少算普通电影但通过 3D 再现软件制作的电影中，我们有可能零零散散地选择人物的特征。对于电影原声经典，一旦你决定了演员，你的大多数选择可能都会被设定好，但仍然存在需要从不同角度，不同距离等来展示他的问题，口头文本则不需要做出这些决定。

然而，与语内转换不同，符际转换（在一般事例中）确实是一种双重的言语传播行为，必须把两种行为包含的发送事例和接收事例都考虑在内。但对于“引号中的‘翻译’”仍然存在其他问题。因为，至少在目前，尽管翻译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传达源文本的含义，但很少有人能制作出完全基于一部特定小说的电影。相反，小说只是新创作的托辞，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比如斯坦尼斯拉夫的《索拉里斯星》），小说本身比起只为了进行新创作而被当作托辞的小说有更丰富的内容。这个例子可能与画家为著名的文学艺术作品所作的插图有所不同，如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居斯塔夫·多瑞（Gustave Doré）等人的画作，这些画作注定要依照但丁的《神曲》进行创作。在以上的所有情况中，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探究，要求区分对作品来源、对其他目的、及对或多或少无意识地对当时生产产生的文化影响，当然，甚至是对个人的心血来潮，这也许能够解释这一系列对相同的文学作品进行说明的图像之间的差异。

4. 在相同的符号资源之间

戈尔莱似乎没有谈论任何由雅柯布森进行了区分的第二种“引号中的‘翻译’”。尽管当她引用雅柯布森体系时提到过几次（有时，戈尔莱会混淆“语际翻译”与“语内翻译”，这样的事太容易发生了；[see Gorlée 2015: 113]），但她从没有对其本质深入研究过。我在其他文章中提到过：有时，如果我们可控的因素是观众，雅柯布森的“语内翻译”则与翻译本身有相似之处，但如果我们可控的因素是指称对象，那两者则完全不同（see Sonesson 2014a,b）。

在语内转换的情况下，似乎不需要双重的言语传播行为，至少不需要任何包含额外参与者的行为。首先，这一点似乎与翻译完全相反：在翻译中，你寻找一个新的表达式，并尽可能地保持内容相差不大，而在语内转换中，为了使指称对象变得更加真实，你替换一个新的符号，其内容部分保持不变，但其表达可能变得完全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提及这种具有规律性的实例：当把指称对象的本质考虑在内时，你需要寻找适当的术语。

然而，如果我们假设替换词语是为了特定受众的利益，比如儿童或对所涉及语言掌握有限的外国人，则语内转换会与翻译更加相似。当在翻译时，这里具有规律性的实例就是特定受众。你试图尽可能地传递相同的含义给对不同和/或有限制的知识库进行处理的接收者。这仍然不是双重的言语传播行为。这里也没有双重的群众。即使我们假设主体是根据他最初认为的意思进行“翻译”，他也不必考虑任何先前的行为及其条件——这与真正的翻译有所不同。然而，从单词到语篇去扩展视角，“语内翻译”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外环境和符外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在感知情境中不作为真实对象存在的事物必须被“翻译”（或转换）成语言，而被感知的对象可以，至少一部分，被排除在“翻译”之外。不同的环境可能使“严格定义的翻译”（翻译本身）

也不同，首先是因为语外环境和/或符外环境可能不同，其次则是因为重复的规则可能不同。

这些是对所使用的表达式进行更改的两个原因，但这两个原因只基于相同的语言和相同的符号资源之间。当然，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即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改变和/或从一种符号资源到另一种符号资源的改变是否也可能取决于这些原因。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变化在群众中有其规律性的来源，这似乎相当明显，而不是对所指对象或其他任何事物的充分描述，但可能还存在其他并存的目标。例如，我或许可以在每种相对应的语言中与妻子讨论瑞典现象和墨西哥现象。对于从一种符号资源到另一种符号资源的篇章来说，比如从写作到图像，它显然取决于著名的教堂壁画中扮演“穷人的圣经”部分里观众的转变，但不能肯定这样的情况是否可以推广。一些指称对象，或者是一些关于指称对象的信息，用一种符号资源比起用另一种符号资源则更容易传递信息，这是错误的观点吗？当然，这是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964 [1767]）在《拉奥孔》中的主张，即时间对象能更好地通过语言和图像中的空间对象呈现（see some criticism of this in Sonesson 1996; 2007; 2014b）。

5. “转导”的其他含义

如果我们认为在戈尔莱最近的一本书中（Gorlée 2015:130ff）全面地提到了以上含有转导的三个例子，并且如果在雅柯布森谈论变换的意义上采用这个术语（我谈论的是换位），那我们很困难能在以下事例中识别出转导：亨利·索罗引用荷马诗歌及其应用于美国自然景观上面的习惯、由亨里克·易卜生（Henrik Ibsen）和爱德华·格里格（Edvard Grieg）创作和补充的《皮尔金特组曲》、以及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对《维纳斯》的解释和补充说明。可以肯定的是，格里格的音乐可以作为对易卜生的作品的一种“插图”，在这一方面则与波提切利、布莱克和多瑞对但丁作品所做的插图相似，但格里格所做的甚至比后者更多，因此它几乎不能与易卜生的作品齐头并进。这一点确实比戈尔莱的一些评论（Gorlée 2015: 171ff）更能说明某种抽象的像似性，尤其是存在于格里格音乐里的北欧民间传说，或许格里格在人物和主题的塑造上没有使用很多易卜生的话。我之所以认为格里格的音乐能够成为易卜生的作品的标志性音乐，或者两者由某些相同的意义，是因为，当格里格的音乐与易卜生的作品齐头并进时，与对但丁作品所做的插图不同，音乐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它可以在视觉感知和/或其语言表达中找到对应关系（see Monelle 1992; Agawu 2014）。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只是我在其他文章中称为次要像似性的一个例子，即一旦你知道了含义，你就可以在这个例子中找到其相似性（see e.g. Sonesson 1998）。易卜生和格里格的事例似乎也是戈尔莱（Gorlée 2015: 174,178,198）在没有讨论它们的情况下引用涉及同一文本的“适当翻译”的唯一情况。

更有意思的是戈尔莱提到的像翻译/转导（在上下文中不清楚）的例子，比如“从英语到中文的情书，从阿拉伯语到荷兰语的合法婚姻合同，从古老的意大利语到现代英语的歌剧剧本”（Gorlée 2015: 20,91）。类似于上一个例子的某事物显然适用于对易卜生文本并加入格里格音乐进行的英文翻译，事实上，甚至在此之前，原始文本就在某种程度上遵循着特定的韵律和/或遵守着押韵的限制。如果，除了将相同的想法从一种语言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之外，你还必须遵循相同的韵律，或者让文本适应另一种语言的韵律，又或让文本适应歌唱带来的限制（在使用相同或另一种语言时），那么除了翻译之外，还有其他模式可以规范你的任务。因此，可以说除了大部分真实地呈现易卜生的作品的意义之外，文学翻译还必须遵循来自韵律和押韵的约束性，并且当文本为格里格的音乐时，它还必须遵守可歌唱性的要求。在我看来，我们这里需要关注的是那些所谓的“方案”或“脚本”中体现的不同传统，其中更明显的例子可能是用不同语言写情书或写契约的惯例，并且，正如我上面提到的那样，不同文化中的礼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分享的同种语言。就目前的上下文而言，说明该点会花费太多时间，所以我们无法对不同传统中形成的关于这种现象的不同观点进行讨论，但目前，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有一些观点与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所谓的“人际关系理论”有关，其中提到不同的社会拥有不同的组合（see Sonesson, to appear a）。

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雅柯布森想象中的符号间性。它们是不同的，但又类似于使用符号资源并使用特定的语言来保持不变的例子，也有内容非常相似的例子，但其内容的含义都经过了巧妙的设计，以便于产生传统上应用诸如模仿和讽刺等术语的现象，以及钱拉·热奈特所描述的不同文本的不同变体。米哈伊尔·巴赫金（Michael Bakhtin 1984;1986）和钱拉·热奈特（Gérard Genette 1992）试图深入研究该类语篇，并在之后的事例中对其形式进行分类，两人因此而出名。尽管戈尔莱使用了几次“互文性”这个术语，但她并没有提及这些作者以及他们的贡献，对此我感到很惊讶。

“互文性”是巴赫金针对这种现象进行讨论的法语术语，朱莉娅·克丽丝蒂娃（Julia Kristeva）因介绍该术语而著名。尽管如此，戈尔莱（Gorlée 2015: 201ff）给出的最后一个例子，即萨尔瓦多·达利对《米洛维纳斯》的解释和补充说明，显然属于这种情况。可以说，为了再次适应巴赫金的语言，由原始创造产生的社会认可目的，即社会认可目的的更深层次且其前一层的内容由多种因素所决定，已经被添加了新的内容，从而产生滑稽模仿和/或讽刺性意图，虽然它并不是让正在讨论中的作品与任何语言或符号资源相联系，而是与另一种特殊的艺术作品相联系，但要求存在符际关系。

在该文本中，人们可能想在哪里放入尤金·奈达（Eugene Nida 1959; 2003）关于调整圣经文本的观点，该观点不仅适应于特定群众的语言，还适应于他们所有的世界知识和预想，甚至将景观转变为群众能认识的事物，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其他文化中的人们相信圣经的核心信息。言语传播行为中，所有的翻译都含有需要接收者适应的某些方面，也含有对在不同部分中原始言语传播行为的发送者的需要适应的方面(see Sonesson 2014a, b)。但是，比如当符际行为包含语际行为时，何时不再仅仅是一种翻

译? 显然, 在某些时候, 说服的目的变得至关重要 (see Sonesson, to appear b)。然而, 这里的不同之处在于, 虽然有一个源文本可以添加这些传教意图, 但奈达肯定不会对这种需要超越原内容去认知的原始文本感兴趣----这与需要模仿和讽刺存在的认知形成鲜明对比。

结论

一方面, 丁达·戈尔莱的新书为发现不在普通市场出现的皮尔斯语录提供了丰富资源, 另一方面, 该书试图超越雅柯布森提出的准认同, 既雅各布森术语中的“严格定义的翻译、重写、变换”。书中也没有清楚叙述前一部分应该如何为后者做出贡献, 特别是没有超出对皮尔斯著作的引用。本书做出的贡献在于对转导概念的介绍, 虽然其介绍不清楚, 但提供了一些在研究符号间性时可以考虑在内的例子, 正如本文所举的那些例子, 这些例子包含了一些应用于翻译过程及其结果的更深层模式, 且这些例子接近于巴赫金的概念, 克里斯蒂娃将其命名为“互文性”, 后来由热奈特以更严肃的方式进行探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向本书致敬, 它扩大了探究符号间性领域的范围, 超越了罗曼·雅柯布森最疯狂的设想。

参考文献

- Agawu, Kofi 2014. *Playing with Signs: A Semiotic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 Music*.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akhtin, Mikhail 1984.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Bakhtin, Mikhail 1986. *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 Austin: Univ. of Texas Press.
- Black, Max 1962. *Models and metaphor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Deacon, Terrence 1997. *The symbolic species: the co-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human brain*. London: Allen Lane.
- Derrida, Jacques 1967. *De la grammatologie*. Paris: Minuit.
- Duner, David, & Sonesson, Goran 2016. Encounters: The Discovery of the Unknown. In: Duner, David & Sonesson, Goran (eds) *Human Lifeworlds: The Cognitive Semiotics of Cultural Evolution*, 267-300. Frankfurt/M.: Peter Lang.
- Eco, Umberto 2004. The Plants of Shakespeare. In: *Mouse or Rat? Translation as Negotiation*, 9-31.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 Genette, Gerard 1992. *Palimpsestes: la littérature au second degré*. Paris: Seuil.
- Gorlee, Dinda 1994. *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of Charles S. Peirce*. Amsterdam: Rodopi.
- Gorlee, Dinda 2015. *From translation to transduction: The glassy essence of intersemiosis*. Tartu: Tartu University Press.
- Higgins, Iain Macleod 1997. *Writing East: 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Jakobson, Roman 1959.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Brower Reuben (ed) *On Translation*, 232-239.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Jia, Hongwei 2017. Roman Jakobson's Triadic Division of Translation Revisited.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13(1): 31-46.
- Keane, Webb 2013. On spirit writing: materialities of language and the religious work of transduc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N.S.)* 19, 1-17.

-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1964 [1767]. *Laokoon oder über die Grenzen der Malerei und Poesie*. Stuttgart: Philipp Reclam.
- Malmberg, Bertil 1971. *Språkinläring: en orientering och ett debattinlägg*. Stockholm: Aldus/Bonnier.
- Malmberg, Bertil 1974. Derrida et la semiologie: Quelques notes marginales. *Semiotica* 11:189-199.
- Monelle, Raymond 1992. *Linguistics and semiotics in music*. Chur: Harwood Academic.
- Munck, Thomas 2000. *The enlightenment: a comparative social history 1721-1794*. London:Arnold.
- Nida, Eugene A. 1959.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as Exemplified by Bible Translating. In: Brower Reuben (ed) *On Translation*, 11-3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ida, Eugene A. 2003. Language and Culture: Two Similar Symbolic Systems. In: Petrilli, Susan(ed)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413-424. Amsterdam and New York: Rodopi, 2003.
- Petrilli, Susan. 2003. Translation and Semiosis: Introduction. In: Petrilli, Susan (ed)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17-37. Amsterdam and New York: Rodopi.
- Ricoeur, Paul 1975. *La métaphore vive*. Paris, FR: Seuil.
- Silverstein, Michael 2003. Translation, Transduction, Transformation: Skating “Glossando” on Thin Semiotic Ice. In: Paula G. Rubel & Abraham Rosman (eds) *Translating Cultures. Perspectives on Translation and Anthropology*, 75-108. Oxford: Berg.
- Sonesson, Goran 1996. The quadrature of the hermeneutic circle. In: *LSP and theory of translation. Acts of the XVI Vakki symposion, Text and Image, Vöjri, February 10-12, 1996*, 9-33. Vaasa.
- Sonesson, Goran 1998. That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iconical signs. *VISIO* 1(1): 33-54
- Sonesson, Goran 1999. The signs of life in society – and out of it. *Sign System Studies* 27, 88-127.
- Sonesson, Goran 2006. The meaning of meaning in bi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A semiotic reconstruction. *Sign System Studies* 34(1): 135-214.
- Sonesson, Goran 2007. Den allra nyaste Laokoon. Lessing i ljuset av modern semiotik. In: Rossholm, Goran & Sonesson, Goran (eds) *Konstverk och konstverkan*, 96-128. Stehag & Stockholm: Symposium.
- Sonesson, Goran 2014a. Translation as a double act of communication. A perspective from the semiotics of culture. In: Wang, Yongxiang, & Ji, Haihong (eds) *Our World: a Kaleidoscopic Semiotic Network. Acts of the 11th World Congress of Semiotics of IASS in Nanjing, October 5 – 9, 2012, Vol. 3*, 83-101. Nanjing: Hohai University Press.
- Sonesson, Goran 2014b. Translation and Other Acts of Meaning. *Cognitive Semiotics* 7(2): 249-280.
- Sonesson, Goran 2015a. Bats out of the belfry: The nature of metaphor,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pictorial metaphors. *Signs and Media* 11, 74-104.
- Sonesson, Goran 2015b. Phenomenology meets Semiotics: Two Not So Very Strange Bedfellows at the End of their Cinderella Sleep. *Metodo* 3(1): 41-62.
- Sonesson, Goran. To appear a. New Reflections on the Problem(s) of Relevance. In: Hisashi Nasu & Jan Strasheim (eds) *Relevance and Irrelevance: Theories, Factors and Challenges*. Berlin: de Gruyter.
- Sonesson, Goran. To appear b. The rhetorical act in-between translation and seduction. To appear in: Eviropides Zantides, (ed.) *Semiotics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Culture of Seduction*.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ers, 32-52.
- Torop, Peeter 2003. Semiotica de traduccion, traduccion de la semiotica. *Entretextos: Revista Electrónica Semestral de Estudios Semióticos de la Cultura* 1, <http://www.ugr.es/~mcaceres/entretextos/pdf/entre1/torop1.pdf> (Accessed August 20, 2014).